

多重时间

——苏州与另一种世界史

“一九三七年吴中文献展”在“七七事变”前夕于苏州可园举办。当年展览集吴中文物之精华之大成，开吴中文物之先河，盛况空前，展出各种文物典籍四千余目，约六千余件。该展览的筹备工作由时任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蒋吟秋策划，集公立收藏与私家收藏为一体，一并向公共展示。此理念在当时的世界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甚为领先，更可贵的是此昌明之理念得到了吴中各大藏家、知名人士和学者一百八十余人的齐心协助鼎力支持。放眼世界博物馆学，自一九五五年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之后，“文献展”的模式已经成为国际诸多城市展示其当代文化艺术的通用做法之一。“一九三七年吴中文献展”在全球文献展系统中当属先驱，更重要的是，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这次展览别具意味。

而今核查当年展览文物的目录，百不存一。为了让盛极一时的“吴中文献展”不成绝唱，我们二〇一六年以“苏州文献展”重返历史，按图索骥，追寻“吴中文献展”的遗存。我们尽力从各个博物馆、图书馆收集当时的展览图录、书籍、书画与报刊，留心散落于民间的部分资料，经过整理和初步研究，尽可能复原与重建。地方文献是维系中华文化绵延、编织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纽带，激活苏州的文化与历史，其目的还包括重新开启苏州的引领性与当代性，这是我们展览的重要使命与追求。

但这绝不是历史文献与当代艺术的简单结合，在“吴中文献展”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策展理念深基于一种新的史观，生发于某种世界史图景的绘制变迁。在全球化——或者准确地说——世界体系视域中审视历史的今日，对世界史的新书写需以全局的目光，突破单纯的地方史、区域史、国别史和民族国家框架，在全球视野下采用散点透视、平行叙述的策略，对各地区和文明之间的有机联系与互动进行历史重构与解读，打破西方（或任何）中心主义，在平等全面的框架中铺呈出立体的历史图景。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我们对于具有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城市，对于它的文化历史内涵的挖掘与演绎，不应止于传统、单一或内部的文化历史，而应以“多重时间”（多维度、体系的）观照为方法，将重要的传统城市及其文化视为构成世界历史体系的要素之一，关注其与世界的碰撞与交流，以及所构成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性因素。在世界多元性、体系性的理念下，把世界时间和中国传统时间同时相对化，在当代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并而行的情境中，让“多重时间”释放出的“城市——世界”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苏州，这座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鲜明中国文化传统特征的城市，是我们在“多重时间”框架下理解中国传统城市的典型案例。

一、帝国时间与海洋时间

二〇〇九年，一幅被称为“塞尔登地图”（十七世纪英国海洋法学者塞尔登所捐献的东西洋航海图）的中国古航海图，被遗忘了几个世纪后，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无论是海外汉学家还是制图专家，都未曾见过这样一幅地图。它凝聚着明代中国制图技法的精华，却因长久地流落他乡而被人忽视和遗忘。从“大航海”的视角分析，可以发现“塞尔登地图”是当时最精确的东西洋航海图，“无论是过去，还是接下来的四百年中，都没有另一幅地图能够望其项

背”。而且这幅图还早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壮举郑和下西洋，呈现了四百年前东亚地区民间海上贸易的盛况。

与塞尔登地图同样有着非凡意义，且勾画了同一时代西方不同景象的则是一五〇七年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绘制的、被称作美国出生证明的、西方最负盛名的一张世界地图。两幅地图都极为重要，但意义却各不相同。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是在新大陆刚刚为人所知的时候绘制的。新大陆的发现迎合了欧洲的猎奇心理，这迫使他将现有的制图模板利用到极致，然而又不得不在九年后抛弃它，以顺应一种能更好涵盖整个地球的新几何学潮流。同样，塞尔登地图也是中国在地球另一端发现新大陆的激动下应运而生的。它描绘了当时中国人所知的那片世界：西抵印度洋，东接香料群岛，南邻爪哇，北望日本。但是，塞尔登地图的绘图者创造出一种重要而不失美感的方法，从历史、地理、文字、法律和科学技术的角度，以中国的绘图方式重新设计了世界的版图。

两幅地图并置之下，以苏州太仓刘家港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与世界在海洋时间与帝国时间的交汇。在那个时代，数以万计的普通人离开家园去寻找工作，既是谋生也是冒险。数以万计的船只往返于欧洲和亚洲各大港口之间，一个大洲的商品改变和建构了另一个大洲的经济。明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强盛的陆地帝国，同时也是一个富饶的海洋国家。但它并未以武力征服周边诸国，而是通过航海贸易在东南亚地区建立起深厚的根基。

郑和下西洋创造的航海奇迹是以苏州时间为起点来刻画世界时间的叙事，从太仓刘家港进出的外交使节，开启了这一时刻，刘家港成为全国第一个享受海港待遇的内河港口，将创造和书写出时间碰撞中的交通史。可以说，在一八四三年上海开埠之前，苏州已是“帝国与海洋”的多重时间的时针，苏州是被遮蔽的“另一种世界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今天在探讨中国的、苏州的历史，必

须同时以帝国时间与海洋时间为对照，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多重视角，洞悉世界历史的“多重时间”，以考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起源点上的全球贸易史，带出以苏州为线索和源头的经济文化变迁，参以古代丝绸之路与当下的现代贸易和交流新路线之间的关系，显现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独特的作用与地位。

二、明清的现代时间

苏州在开启亚洲、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元朝时，苏州作为政府实施漕粮北运的第一码头，在太仓刘家港不仅建立了帝国的海运仓储和海事机构，统摄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温台等沿海地区，而且成为使日本、琉球、高丽、安南等国的商船都集结于此的“六国码头”，奠定了外向型发展的海洋文化基础。即便限以帝国的疆域和文明圈考量，设置于太仓的内承运库（被称为太仓银库、太仓库），从洪武到崇祯朝，存在于明王朝的始终。太仓库的盛衰反映了明代的政治、经济、皇权与内外臣的关系，以及内陆边疆与中原的关系变化，其后果是对沿海地区现代性的推动——明朝政府为了抵御蒙古和女真（史称“北虏”），派出大量军队驻扎在北方边境，经由苏州太仓银库运到北方的军费，从十六世纪后半叶的每年两百万两增加到四百万两，几乎相当于每年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数量。北方军费越增加，内地的白银就越不足，纳税就越困难。随着国内白银不足的严重化与需求的持续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一条中国现代社会开启的重要线索——“银线”由此形成。“银线”涉及白银在中国各个区域的大规模流通情况：白银的流通机制、白银与铜钱在经济层次中的复杂关系、白银的使用与经济结构的关系等问题，还有货币供应、价格浮动、使用层次等经济活动。这从一个侧面描绘出十九世纪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的轮廓，正是由于这样一根“银线”的存在，“北虏”与“南倭”以白银流动

为媒介密切地联系起来。

与“银线”并置的还有中国的另一条线——“参线”。东北的人参，俗称“辽参”，在明中叶之前并非受欢迎的品种，山西上党出产的“党参”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大大超过“辽参”，但明末随着女真族在北方地区活动，使得“人参”成为当时东北亚边境贸易中数量最大宗的物品。来自南方的白银和来自东北的人参在此进行交换，大量购入人参则是因为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温补”习俗的兴起。“银线”和“参线”的重合与循环，意味着由“边境社会”的视野重返“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关联，也清楚勾勒出明清时期在何时被卷入整合度较高的世界经济的复杂关联中。

就帝国内部而言，明清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大量手工工场，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与劳工的关系，这种中国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撕裂了传统的文明样式，技术的工业化、阶层变动、公众团体和市场、新兴的意识形态、权力格局的变迁都被强势压缩于江南时空中。当时苏州中心城市人口长期保持在五十万以上，最高长期居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将近三百万。如果将中国的现代性放置于全球现代化构成中加以辨别，此时的中国以及亚洲正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苏州正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核心城市、明清时期中国超地域的中心城市、当时中国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与文化中心。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性的多种内核与复杂性、“多重时间”性在苏州有典型的呈现。

从明代中期至太平天国，苏州城市中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民”世俗世界，极具现代性的市民世俗生活的图景生动地保存在小说、诗文、评弹及戏曲中，尤其是在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和宫廷绘画中更有直观呈现。从清前期和中期，许多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画工和刻工，为了寻求更广阔的艺术市场，他们纷纷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去日本长崎登陆，不但带去了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画稿、技术、

材料，更重要的是带去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世俗文化与市民生活方式。从世界艺术史上看，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影响了日本“浮世绘”的产生，而日本“浮世绘”又影响了法国印象派的产生。从思想史上看，苏州的市民文化的传播撬动了“明治维新”产生的可能。这是苏州文化与生活对日本影响最突出的一脉，也是被忽视的另一种世界史观照的角度。

明清贸易、市民世俗生活、文化艺术，以及近世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新的政治主张的联通，合力形成了中国近世“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也可称之为由苏州引发的“明清的现代时间”。

三、活化的天下时间

苏州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微小的，庙堂之外的，又是宏大的，心怀天下的，兼具市民日常生活和世界都市史的历史纬度。在苏州意义的重新塑造与探求中，民间尺度与话语、民俗时间的考量不可或缺。中国的现代进程中，传统和现代两种社会体系的交替难免产生多层面错位、对接与抵抗，苏州这种富于历史文化底蕴、极具代表性的城市呈现出天下时间观与民俗时间观的协调与博弈。

苏州时间的民间活化历史，上可追溯至周、下可延至今日，颇像中国文化历史内部自我纵向打通并激活。苏州可能是目前中国唯一坚持按“周历”过年的城市。周代的过年时间是冬至，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过年时间明确为春节，可是苏州地区的百姓流传至今的一句话是：“冬至大如年。”这足以清楚地看出苏州市民迄今为止还享用着“周历过年”，象征着天下的周代时间仍旧是苏州时间之一。苏州的时间具有特殊性，不仅苏州市民一年中过了“两次大年”，而且苏州社会思想与生活习俗的变迁过程中已适应多种时间的并存。在苏州市民看来，另一种时间与生活不仅不违背现代，而且是美好和谐的，是构成城市自我认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比如，“苏州的北宋时间”在苏州斜塘王墓村延续至今。北宋末年，北方兵祸，百姓流徙。由于北宋大量的官员携儿带女迁入杭州地区，而杭州地区作为一个都市本来就有大量人口，不可能全在杭州城里安排庞大的官僚体系，就选一个交通方便而且环境比较好的苏嘉杭地区安排官僚与流民。这样，许多北宋流民就落脚在苏州独墅湖斜塘王墓村碧水芳草之畔。当时，归乡无期，乡愁不绝，众多流民就修建土地庙，庙门朝北，一告北方先祖游子不忘故土，二感王墓一方土地庇佑之恩。历经八百余年沧桑，当地北宋流民后裔坚守着北宋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伦理关系及语言特征。直至今日，流民后裔家中遇事，邻里纠纷不能排解者，仍有按照北宋遗律，众人来土地庙“摆台”求公道，按照流传至今的习俗，由当地村中的“香头”以说唱的方式替事主排忧解难，现编现唱的吴方言中夹杂着中原故语。村中所有的老人坐镇在庙内担负着“陪审团”的角色，村中发生的纠纷均在土地庙中由“香头”决断，可见这一形式，既秉持北宋遗韵，又公开民主。一般而言，时间在眼前千般变幻，而北宋的时间与北宋规制却传承和凝固在王墓村和土地庙中。在王墓村土地庙旁有一方石碑，虽历风雨，依稀还可显露出一些碑文：“北望中原，金戈铁马，秋风残阳怀先祖。南居斜塘，碧水芳草，王墓土地慰流民。”

苏州还混杂着南北时间与文化。从南北文化而言，是苏州人的皇家建筑思想铸就了明清皇朝的“天下”视觉美学：以天安门城楼为开端的故宫，由苏州香山帮的蒯祥担任总设计师，几代苏州香山帮建筑设计师和工匠的手艺营造出巍巍壮观的皇家建筑群——故宫，这一皇权统治天下的象征物。苏州园林是苏州文化的重要元素，可是私家园林文化是对应宫廷文化的建筑，具有非常不同的美学特征。可以说，苏州人不但可以营造出苏州园林美学，也营造出皇家宫廷美学，不但拥有民间园林时间，也怀有庙堂天下时间。

四、时间中的飞地

苏州园林，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美学的结晶，人类建筑的瑰宝，像永恒的“时间飞地”，承载和传承着中国文人的浪漫情怀。古典园林与苏州文化的独特性密不可分，可以说，这一“时间飞地”——外界识别苏州的标志，凝聚交织着历代园主们的心灵，蕴含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密码。同时，苏州园林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又蕴含着特殊的文化政治意义。园林，是时间和文化中的飞地。一方面，苏州园林是私人属性的建筑财产，承载着文人自身的情怀与审美，并由此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与文学样式，是关乎家族与地方的载体；另一方面，这些园林的主人大多为官宦，身处朝廷，仕宦身份鲜明，园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天下时间的表征。可以说，园林成为观察中国、江南特性中民间与官方、天下与个人、公与私时间重合与交界的典型对象。苏州园林只是朝廷的“另一种在场”，大部分园主对朝廷是持不同政见者，或高官退隐，或被朝廷处分，园主们表面上筑起高墙、叠石、理水、栽花、雅集及寻欢作乐，常以“沧浪亭”“拙政园”和“退思园”等园名明志，实际上裹挟着怀才不遇的怨气，是用政治反讽式的园名禀告皇上，以园名表达自我反省、退身为隐士的政治表态。可是苏州园林的园主们没有真正甘心退隐，往往是具有天下政治抱负之士，日夜期盼皇上开恩，飞来一叶诏书，园主们即吟“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句，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奔帝都，报国效忠。

在时间的飞地与园林邂逅，是以一种新的视角重返苏州园林，是为了发现“历史的邂逅”与“时间的交错和延伸”。对园林的探索和再现将勾连、重合、离散苏州时间、天下时间及世界时间。苏州园林潜藏的诉求与文人园主的精神，他们在各自时代心神恍惚的心灵表达、梦想与失落，托付于园名的傲骨与禅机，成就了历史与意外的“天下”文化的潺潺活源。如果将这样的人文心灵与创造，这

样的潺潺活源放在世界史、全球史的时间和空间双重视域下，又会散发出什么样的光芒，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历史图景？

与园林邂逅是带着当代艺术的视角与对当代性的思考，恂恂重访私密的园林。在这些见证千年姑苏历史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场所，“多重时间”作为一种观察与思考的方法，将使当代艺术作品与园林邂逅，以园林之魅影的时间、邂逅的时间、惊梦的时间等片段进行演绎，将更为多样的文学、戏曲、影像等媒介并置诠释，在这样的瞬间发明陌生的“在场”，历史流转中的时间飞地由此呈现，多重时间相互问候、相互动情、相互激活。

上述四个主题与纬度的建构，以新全球史视域来观察与诠释苏州这座城市在不同时空维度中的文化历史，以当代艺术的方式呈现、重绘苏州与世界的关联版图。以苏州作为一个点、一个城市典型进行讨论，使中国的历史、亚洲史乃至另一种世界史、全球史，彼此在关联中生动起来。这些多重时间会构成一种互补和辩证。同样，“多重时间”亦是 can 指向具体问题和新型世界史视野的路径。以“多重时间”对中国传统城市做时间立体化的叙事，进行认识和想象，是在深入内部具体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将中国历史与传统的概念向外生展，在广泛的全球联系与历史对仗之中使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如苏州）的整体生存与全球视野紧密关联。我们尝试以新的全球史叙事方式，打通内陆史和海洋史分开审视的格局，又立足于东亚特殊的现代性（一种与欧洲不同的现代萌芽），在新的自我认识框架中以“多重时间”考察与发现苏州，以这些具有活力的史学新论、知识视野，作为“苏州学”诞生的宣言。